

北京教育丛书

Beijing jiaoyu
congshu

○ 范燕生

普通话的 教与学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教育丛书

普通话的教与学

范燕生 著

北京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话的教与学 / 范燕生著.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1998.9
(北京教育丛书)
ISBN 7-5303-1650-8
I. 普… II. 范… III. 普通话-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815 号

普通话的教与学

RUTONGHUA DE JIAO YU XUE

范燕生 著

*

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125 印张 140 000 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3-1650-8 / G · 1625

定价: 8.70 元

序

徐惟诚

教育事业的重要，已经日益被愈来愈多的人认识了。

中国要振兴，归根到底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奋斗，要靠我们的全体劳动者创造出数十倍于今日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全体国民素质提高的过程。人们自然要寄希望于教育。

要搞好教育，需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靠教师。尤其是担负着国民基础教育任务的中小学教师。

教师的重担，关系着祖国未来的命运，也关系着每一个教育对象未来的命运。他们所教的学生在未来的社会条件下，究竟怎样做人，怎样立身处世，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也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在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

我们知道，人，是世上已知物质发展的最高形态。关于人的意识、观念、智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我们离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需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教育育人第一线工作的广大中小学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的发展应当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一辈子的心血都用来为祖国培育后代，造就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理当成为整个教育战线的共同财富。可是由于种种原

因,这件总结和传播经验的工作过去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拨出专款,指定专人组成编委会,编辑出版一套《北京教育丛书》。这个决定受到广大中小幼教师的欢迎和支持。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已经报来几百部书稿。又有一批热心而有经验的同志担任编审工作,看来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相信,《北京教育丛书》的编辑出版,对于鼓励广大教师钻研业务,积累经验,对于传播和交流这些经验,对于推动教育科学研究,对于提高普通教育的水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这套丛书的出版,也将有助于人们认识教师所作的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改革和建设的大潮在祖国大地上汹涌澎湃,每天都有许多新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也把许多新问题提到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面前。这是一个需要有许多新创造的时代。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为祖国的振兴所建立的功绩,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写在前面

我在学生时代就特别喜爱朗读文学作品，毕业后又成了一名语文教师，这样，就跟语言文字有了不解之缘。

我出生在北京，但父母是外地人，所以小时候最先学会的是家乡方言。在北京城里说方言会遇到很多不便，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家里让我到胡同中的油盐店买碱时，总要嘱咐我“买蒸馒头用的碱”，最初我还以为蒸馒头用的碱跟洗碗、洗衣服时用的碱不一样，后来才明白，在我家乡的方言中“碱”和“姜”读音相同，如果只说买碱，人家会误认为是买姜。这就促使我开始注意北京话与家乡方言的区别，认真学习北京话。

到了上学的时候，我说北京话已经相当熟练，即使在家中也用北京话与父母交谈。参加工作以后，本以为语言上不成问题了，但由于是教语文，每天都与字音打交道，就需要常查工具书，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很多读音都不标准，如把“倾心”的“倾”(qīng)读成上声，把“即使”的“即”(jì)读成去声等，这使我明白了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我又开始注意北京话与普通话的区别，认真学习普通话。辨析方言与普通话在语音上的差异，总结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是我学习普通话的经验。我把自己学习普通话的体会和经验自觉地运用到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在语文教学中推广普通话的做法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同行的好评。我曾作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还参加了全国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通过参加全国性推广普通话会议，聆听领导和专家的报告，与各省代表的

交流,我对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学到了很多推广普通话的经验。从1983年开始,我在教语文课的同时,承担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我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把推广普通话纳入学校的教学工作之中,举办了多种全校性的推广普通话活动,使推广普通话工作受到全校师生的重视。1994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之后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期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考核培训班,成为一名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1995年,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指定我校为北京市对师范学校毕业生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试点校,完成试点任务后,我校在全市师范学校有关会议上介绍了经验。

1995年以来,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聘请我连续四次担任市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考核培训班的语音辅导教师。在此期间,我还对部分师范学校的毕业生,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香港中小学普通话教师进行了普通话水平测试。我为能够有机会多做一些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感到高兴。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自己的普通话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目前正在进行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标志着推广普通话进入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必将对普通话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不仅有指导学生参加测试的任务,自己也要参加测试。而现在的语文教学还不能适应测试的需要,很多教师对测试也不太了解。针对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我试图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要求出发,来谈谈自己在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和推广普通话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重点是语音,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的词表中收词两万多条,既不利于教,又不利于学生掌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对近三年来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发现的语音错误进行了分析整理,找出一批读错率较高的词语分门别类地

列入书中,可以作为语音训练材料。

十分感谢北京教育丛书编委会给了我一个总结教学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经验的机会。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会办公室同志的悉心指教和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范燕生

1998年8月8日

《北京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 徐惟诚 汪家镠 李 晨 韩作黎

主 编: 李志坚

副主编: 姚幼钧(第一副主编) 陶春辉 蓝天柱

史文炳 倪益琛 仇 琨 徐安德(常务副主编)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芯兰	于美云	王 有	王广和	王永新
王光裕	王家骏	王碧霖	仇 琨	方道霖
白 耀	史文炳	史根东	叶钟玮	司锡龄
安永兴	安邦勋	祁 红	刘士俊	刘永增
刘秀莹	刘尚永	江丕权	孙学增	毕晓尘
吴同瑞	李 斌	李志坚	李观政	肖 沅
佟志衷	沈友实	杨玉民	杨志彬	余世光
陈孝彬	陈镜孔	金德全	林 慈	范小韵
罗玉圃	张广茂	张国忠	张觉民	张振芳
张鸿顺	线长安	邹甫昌	赵 俭	赵志洁
赵 毅	姚幼钧	胡红星	钮辰生	高玉琛
徐安德	郭汝康	倪传荣	倪益琛	耿 申
章家祥	陶春辉	侯维城	崔万顺	阎立钦
曹福海	梁慧霞	董哲潜	傅 庚	温寒江
赖登铎	蓝天柱	端木慧		

北京教育叢書

雷洁琼題



第一章 普通话概说	(1)
第一节 什么是普通话	(1)
第二节 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意义	(16)
第二章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形势	(21)
第一节 建国以来推广普通话工作的进展	(21)
第二节 推广普通话工作面临的问题	(27)
第三章 以普通话水平测试促进普通话的教与学	(35)
第一节 什么是普通话水平测试	(35)
第二节 怎样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	(40)
第三节 做好普通话水平测试前的培训工作	(45)
第四章 教、学普通话应以语音为重点	(54)
第一节 普通话教学要把语音放在首位	(54)
第二节 怎样教普通话语音	(57)
第五章 学习普通话应重视朗读教学	(113)
第一节 朗读训练是学习普通话的重要环节	(113)
第二节 朗读要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行	(120)
第三节 朗读教学要突出师范学校的特点	(126)
第六章 学习规范口语应加强教学口语的训练	(142)
第一节 提高师范生对口语训练重要性的认识	(142)
第二节 口语训练要注意的问题	(147)
第七章 师范学校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应发挥带头作用	(162)
第一节 从培养合格小学教师的高度认识推广普通	

	话的重要意义	(162)
第二节	推广普通话工作应纳入学校管理常规	(165)
第三节	推广普通话工作应与语文教学结合起来 ...	(168)
第四节	推广普通话工作应与教育科研结合起来 ...	(173)
第五节	做好本校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178)

第一章 普通话概说

第一节 什么是普通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发达、最重要的语言之一。但是，汉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方言分歧，给各地人民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便，因此需要一种通行全国的共同语言，就是现代通行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普通”不是普普通通的意思，而是“普遍、共同”的意思。普通话的含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

一、普通话的形成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地域最辽阔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五方之民，言语异声”（《礼记·曲礼下》），就有了方言分歧。《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个楚国的大夫在这里，想要让他的儿子学习齐国话，是让齐国人教他呢，还是让楚国人教他呢？可见当时楚语与齐语已有显著差异。西汉扬雄所著《方言》（全名为《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重要著作，从《方言》所记录的各地词语可以看出，当时明显存在着方言分歧。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少数民族人居中原，大批汉人因社会动乱不断南迁，进一步推动了方

言的发展。到了今天,方言仍然存在。现代汉语方言可以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官话区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非官话区包括吴方言区、赣方言区、湘方言区、粤方言区、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

尽管汉语存在着方言的差异,但自古以来,汉族人民就有用共同语交流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就是一种共同语。雅言是雅正之言的意思,又称“夏言”、“正言”,是周王朝使用的以其国都镐京语音为准的官方语言,是中夏区域间的共同语。孔子号称有弟子三千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的弟子除鲁国人外,还有齐国、卫国、吴国、陈国、宋国、楚国、晋国、秦国人,方言的隔阂可想而知。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如果用方言进行教学,势必会造成交流障碍,影响教学效果。因此,孔子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是当时的规范语言——雅言。《论语》这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孔子有用雅言的时候,读《诗》、读《书》、执行礼仪的时候,都用雅言。

自秦汉以来,由于有了统一的文字,使书面语趋于统一,各地口语语音上的分歧在书面语中得到了缓解。这对共同语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在汉代,共同语被称为“通语”。这是沿袭周代雅言而发展起来的主体语言。西汉扬雄在《方言》中,对记录下来的词语分别注明“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通语”等。所谓“某地语”即通行区域较小的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某地语”大的方言,“通语”则是各地普遍通行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当时的方言复杂纷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供各地人民互相交际、传递信息的共同语。

从元代开始,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这对传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共同语起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周德清(1277年—1365年)在其所著的《中原音韵》(1324年)中,把当时的共同语称为

“天下通语”。从这个名称可以看出其通行区域是很广的。《中原音韵》这部书是“为作词而设”，成书时正是元代戏曲盛行时期，作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情况整理成书，成为北曲创作和演唱的语音规范。书中指出，自元朝建立以来“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这里，“中原”指的是元朝的大都（即今北京）。作者认为，要更好地发挥北曲的艺术效果，就必须有明确的语音规范，“欲作乐府，必正言语，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这部书就是以中原之音作为审音标准的。这个语音系统跟现代北京音系统已经比较接近了。在《中原音韵》中，约有20个声母（不含零声母），和现代北京话近似，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和现代北京话完全相同。这说明当时北京语音已经取得了北方标准音的地位。

汉民族共同语到了明代取得了“官话”的名称。这一名称表明了它的地位、性质和使用范围。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说：“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这说明当时官话已渗透到南方方言之中。官话也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它随着当时的政治力量和白话文学的力量传布到全国各地。明朝初年，朝鲜语文学家崔世珍为朝鲜人学习汉语编写了两种会话书：《老乞大》、《朴通事》，书中语言与元曲说白里的语言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是当时的北京口语。可见，这种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民族共同语已被外国人承认是汉语的代表。

到了清代，官话得到了进一步推广。雍正皇帝于1728年9月9日颁布上谕，要求官员必须掌握官话。上谕说：“内阁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而办理无误。”上谕指出了当时部分官员仍说方言的状况：“朕每引见大小

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上谕分析了官员不会说官话的危害，指出：如果这些官员“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致胥吏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上谕还指出，“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因此谕令福建、广东两省设立“正音书院”，由在当地驻防的旗人任教，招秀才举人学习官话，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从雍正皇帝的上谕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深刻认识到推广官话的重要意义，而且特别重视官员的语言规范，他还注重发挥教育在推广官话中的作用。到了光绪年间，教授官话已经列入初级师范学堂分科教法。1904年1月13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的分科教法中规定“练习官话，既用《圣谕广训》直解，以教授学童，使全国人民语言合一。”

用“国语”指称官话开始于晚清。宣统年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小学教育改良刍议》一文中，把日语里的“国语”一词借过来代替了“官话”。辛亥革命前夕，中央教育会议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

辛亥革命成功后，开展了“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就是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当时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所谓“言文一致”是指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所谓“国语统一”是指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国语运动对推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3年2月15日，召开了“读音统一会”，正式用“国语”代替了“官话”。读音统一会制定了“注音字母”，审定了6500多字的“国音”。“国音”虽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但由于当时每个字的读音是各省代表用投票方式议定的，所以也夹杂了一些江浙语音，声调中还保留着入声。这样，就使这个读音方案南腔北

调,无法推广。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标准,这种新的拼音标准称为新国音或京音。

“五四”运动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教育部下令在学校特别是师范学校中加强国语教育。教育部开办了国语讲习所,各省区教育厅也分别举办了各种短期国语训练班,培训了国语师资。当时还出版了宣传、研究国语的刊物,以及国语课本、国语字典等。

“普通话”一词最早见于书面是在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朱文熊是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给普通话下的定义是“各省通行之话”。后来,鲁迅、瞿秋白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提到过“普通话”。不过,那时所说的“普通话”都多少杂有地方口音,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因而也被人们称为“蓝青官话”。“蓝青”,意为不纯粹;“官话”指这种话开始只在官场上使用。

“普通话”成为科学术语是解放以后的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空前统一为语言的统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55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将汉民族的共同语称作“普通话”,给普通话制定了科学的定义,并制定了“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的方针,一致同意推广普通话首先从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做起。从此,我国就以普通话指称汉民族共同语,以“普通话”替代了“国语”、“官话”的名称。

由春秋时代的“雅言”,汉代的“通语”,元代的“天下通语”,到明、清两代的“官话”,民国时期的“国语”,以至今天的“普通话”,其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汉民族共同语在两千多年来发展的大体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在口语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现在全国人民公认的普通话;另一方面,宋元以来